

现以个体间公正、平等而非以群体为对象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公民教育，可能是最好的途径之一。

#### 参考文献：

- W·F·麦凯、M. 西格恩, 1989, 《双语教育概论》(严正等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金炳镐、王铁志主编, 2002,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蓝维、高峰等, 2007, 《公民教育: 理论、历史和实践探索》,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戎, 2003,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中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 马戎, 2008,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 年第 2 期。
- 王斌华, 2003,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晓霞, 2009, “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分析”, 载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戴庆霞、滕星等著, 1997,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2007,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汇报》(未发表)。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20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调研报告》(未发表)。
- 《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 年 9 月。
- 《新疆统计年鉴 2008》, 200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新疆通志·新疆志》, 2006,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吴福环, 2008,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新疆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2 期。
- Jacob M. Landau. 2004.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lim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James Moody, 2001, “Race, School Integration, and Friendship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Scho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7(3) 679-716.
- Gerard A. Postiglione, edited. 1999,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Cultur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A member of Th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 【论 文】

# 苏联解体之迷思：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

——读贝辛格《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解体》

马忠才<sup>1</sup>

### 一、引言：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

1991 年，根深蒂固的苏联体系在没有外敌入侵、国内战争的情境下分崩离析，令全世界人民难以置信。苏联是一个具有 74 年历史饱经风霜、历尽艰险的幸存者。历史上，苏联经历了两

<sup>1</sup> 马忠才，北京大学 2008 级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Email: pkumzc@gmail.com.



次毁灭性战争，数次致使百万人丧生的饥荒，社会革命最终将其带入工业社会。苏联是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度，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曾令无数世人欢欣鼓舞，并为诸多学人视为人类共同体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典范。一言以蔽之，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上最出乎预料的事件之一。

回溯历史，至少在 1988 年以前，国际社会和苏联境内无人预测到苏联即将解体，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苏维埃联盟固若金汤，解体是不可能的！持上述看法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西方“苏联研究”专家，也包括苏联学者、苏联境内各界精英和普通群众。原因在于，事发之前，苏联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趋势中并没有显现出解体的任何征兆。当时，各项民意测验都表明，在 1990 年之前，苏联人民热爱并拥护伟大的苏维埃联盟，也坚信联盟将长期存在，至于“崩溃”、“分裂”等概念根本不在人们的意识之内。然而，至 1991 年，就在苏联解体前的数月间，人们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曾经认为苏联体系固若金汤的人们，却悲观地预见，苏联解体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为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人们的价值观念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值得玩味的是，苏联解体之前，学者们没有任何预见，但是，在其崩溃之后，时下流行的观点却是“苏联崩溃是历史的必然”？究竟是什么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既有观点？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另辟蹊径，展开了长达 12 年的潜心钻研，在诟病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贝辛格在 2002 年出版了最终研究成果——《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sup>1</sup>。著作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系统考察了苏联民族运动的过程和机制，阐释了人们的看法何以发生 360 度的急转弯。该书对前人研究的精当评论，以及系统精致的经验研究，以使它成为民族主义经验研究的典范，其卓越的理论贡献更使它成为民族研究的必读书目。

## 二、苏联解体的目的论阐释：事后解释的困境

苏联体系崩溃之后，各种类型的事后解释层出不穷，但总起来说，其核心论点是一致的：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sup>2</sup>

事后解释中，结构决定论具有霸权地位，拥有最多的信众。作为一种目的论解释，其逻辑极其简洁：苏联解体是列宁主义固有的逻辑，因为极权主义本质铸就了它自身的不可变革性，这是共产主义的宿命。在 1992 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信服，因为苏联解体已然成为历史事实，不会再有其他可能性。但是，贝辛格却不以为然。他争辩道，如果该结论准确的话，为什么 1988 年之前没有人看到这一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也没有人预见到苏联解体？而且，在苏联实施“公开化”政策前夕，人们普遍相信苏联体制已经获得了公民广泛认可的正统性，排除了列宁主义出现的民族语境，制度的说服力运行取代了武力强制。<sup>3</sup>也就是说，至少在 1988 年前后，苏联体制并没有显现出不可变革的迹象，因为苏联体系已被社会广泛认受，正是其稳定性和坚固性鼓舞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改革之门。

无独有偶，结构决定论的第二种理论阐释是帝国体系论。该理论指出，苏联解体是因为它本

<sup>1</sup>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本书无中译本，第一章、第二章汉译文见《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88 期。关于本书所有章节的内容介绍包含在第一章的译文中。

<sup>2</sup> 历史必然论在哲学上被称为目的论。柏林（Isaiah Berlin）将目的论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历史具有经社会运动证实的内在的逻辑、本质，超越个人意志；目的论使历史中的社会行动的角色变得无足轻重，其目的是解释历史结果不可避免，并强调这是历史的必然；在目的论归因中，人们凭主观判断想当然的解释一个事件，但是作为宿命论的目的论不会被任何经验证伪，也不能被证实。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17.

<sup>3</sup> See, for instance, Peter Hauslohner, “Politics before Gorbachev: De-Stalinization and the Roots of Reform,” in Seweryn Białal, ed.,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p.41-90.



来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自决<sup>1</sup>成为一个普遍认可的准则时，世界上所有的多民族帝国都注定要被民族国家所取代。据此推断：因为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所以它无法抗拒解体宿命。此类观点具有相似的困境：苏联解体因为它是一个帝国，还是因为它解体了所以被指称为帝国？改革前夕，无人以“帝国话语”描述苏联的民族（nationality）问题。冷战期间，绝大多数学者将苏联描述为“国家”（state）而非“帝国”（empire）。然而，在其终结之后，却突然被公认为“多民族帝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一个曾被公认为“国家”的政体如何突然被指认为“帝国”？

贝辛格指陈，以“不可变革”和“帝国本质”为依据的结构决定论都是事后解释，这与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可能”观点是冲突的，因此必须受到质疑。而且，这一必然论有过度宿命论的倾向，在必然论的语境下，历史发展似乎没有其他可能性。宿命论能够流行，关键在于苏联解体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其实，历史发展并不总是受客观结构的强制，有偶然也有巧合，自然也有其他可能性。为考察其他可能性，贝辛格运用的是布洛赫（Marc Bloch）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策略：“当一名历史学家反思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概率时，他竟然通过大胆的设想能够穿越时空，将自己放到事发之前的某个时间，以此判断历史事件演进的所有可能结果。”<sup>2</sup>

### 三、结构与行动的争论：贝辛格的方法论

结构与行动之关系的争论，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主旨为：究竟是外在、客观的社会事实、情境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是个体或群体的意志和行动导致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贝辛格对此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确立研究的方法论。

苏联解体的事后解释中，除了结构决定论，还有一类行动解释范式，其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缘于一些精英人物的意志和行动。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该书认为，苏联体系之所以崩溃，并非中、下层群众的革命诉求所致，而是苏联党国精英中的亲资本主义一派，在利益驱使下，发动政变，并最终埋葬了苏联体系。<sup>3</sup>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强调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即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和低能作为致使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

贝辛格反驳说，尽管行动解释范式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类解释忽略了结构的作用。因为，在革命、暴动、剧变的那段特殊时期，成千上万的群众每日走上街头，各类运动风起云涌，为民族分离主义造势，撼动着苏联体系。因此，把解体仅仅归因于精英群体的意志和行动就难免牵强。

结构决定论过于强调结构的力量，忽视了个人或群体的意志和行动；反之，行动范式只是强调个人或群体的意志和行动，却无视结构的力量。为避免两类范式的偏颇之处，贝辛格接受了吉登斯关于结构二重性的基本理念：结构既为行动提供资源又约束行动，行动受结构约束而又改造结构。不过，他对结构二重性理论也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吉登斯实际上忽视了结构和行动之间的互动过程，因为，吉登斯在研究某一具体事件时，为关注结构或行动中的某一项，就不得不忽视另外一项的反作用。问题在于，吉登斯的分析是某一时点的定格研究，而非过程分析，只有把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纳入事件的过程之中，才能廓清这种递归作用。<sup>4</sup>因而，贝辛格在研究中，把结构和行动看作是相互作用的过程<sup>5</sup>，这便是贯穿全书的方法论范式。

<sup>1</sup> 民族自决，即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英文表述为“one nation, one state”。

<sup>2</sup>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p.125.

<sup>3</sup>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岐译，《来自上层的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sup>4</sup> 所谓递归作用，即结构影响行动，行动又反作用于结构，二者反复相互作用。

<sup>5</sup> 图示：结构 1→行动 1→结构 2→行动 2→……或行动 1→结构 1→行动 2→结构 2→……。数字 1 表示时点 1 的行动和结构，依次类推。





## 四、苏联解体过程中的结构与行动

贝辛格把结构对行动的作用分为三个相互影响的面向：既存结构的促进功能；制度规范的约束作用；以及行动自身对后续行动的影响（改造或创造的情境性结构）。<sup>1</sup>

### （一）结构性条件：潜在的民族矛盾

“既存结构的促进功能”，指的是结构促进行动的一个面向：以往积累的有利于行动发起的问题和矛盾，既定的行为方式，促进行动的政策制度。贝辛格强调说，民族主义运动跨时空、集中性爆发只会在某些具有特殊结构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正如海洋盆地更容易发生海啸是因为那里的地壳运动更为频繁。

贝辛格认为，苏联有利于民族主义行动发起的结构性条件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历史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斯大林对各民族实行高压统治，限制民族主义表达，推行民族一体化和俄罗斯语化，压制民族文化的生产，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屠杀民族精英，强迫民族迁徙等，这是各族民众产生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其二，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化。苏联为每个公民认定了民族身份，为各民族设定了不同级别的自治地方，致使苏联人民的国家认同常在自治共和国和苏维埃联盟之间摇摆。简言之，苏联体系通常被定义为多民族国家，其要害在于缺乏超越民族的、对国家共同体的忠诚和认同感。特别是在国家出现政治、军事、社会危机时，民族运动就乘势而起。此外，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机会与民族身份紧紧捆绑在一起，因而，民族很容易被建构成利益集团，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形式就是利益博弈。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条件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基本上都能有所保障，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负增长，不论加盟共和国的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会认为，只要脱离联邦，独立预算，就会得到的更多，生活也会随之好转。<sup>2</sup>其三，苏联海外势力的扩张。由于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其境内民族与境外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部争端必然促动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反弹。<sup>3</sup>

在 1987 年之前，历史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并未导致民族分离主义行动，而且在当时，社会各界都认同，苏联的民族问题已得到解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致使尘封已久的民族主义卷土重来？

### （二）制度性约束的弱化：从高压政治到公开化政策

制度规范对行动的约束作用，是指制度规则约束和限制行动者越轨的功能。

1987 年以前，苏联通过政治高压实现了高度稳定。极权和高压统治始于斯大林时代，当时的民族主义表达，抗议运动或独立运动均被中央政府以武力镇压，组织者或民族主义者都会被作为政治犯逮捕关押。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延续了高压政治，坚决打击民族主义。也就是说，苏维埃政府所使用的高压统治手段使得民族主义斗争除了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毫无收益可言。于是，1960 年前后，民族主义者近乎绝望，放弃了斗争。

贝辛格强调，武力强制换取的稳定，压制了公民自由和利益诉求，必然会在稳定的表象之下形成一股地下潜流，外界条件变化时，潜流就会成为冲击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力量。1987 年，戈尔巴乔夫政府实行了公开化政策。其间，政府和社会各界允许、鼓励言论自由，以至于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由此，各式思维、言论，甚至是针对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攻击性言辞在电视、报刊中恰如一股洪流，一发不可收拾。紧随其后，嬉皮士、生态主义者、犹太人被拒移民者、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政见不同者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小规模的游行示威。但是，公开化初期的社会运动并

<sup>1</sup> 吉登斯把“结构”定义为约束行动的规则和利于行动的资源。见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第 113 页。贝辛格把结构分为既存结构和情境性结构。既存结构，是历史以来累积形成的结构；情境性结构，是指因时间、事件而改造或创造的新结构。

<sup>2</sup> Philips Roeder,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sup>3</sup> Seweryn Bialer, *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 (New York: Knopf, 198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不包含民族主义主题，因为，历史上对民族运动的残酷镇压促使民族主义者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边缘观察，权衡，伺机而动。

### （三）行动自身对后续行动的影响作用：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

结构影响行动，反之，行动亦可改造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条件，为后续行动提供便利，这就是行动的递归作用。贝辛格把公开化前期的群众运动称为“试探性活动”，因为人们还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经过试探，人们发现，政府似乎真心要给予人们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力，因为诸多运动都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更没有武力镇压的迹象。这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通过运动争取权益的勇气和士气。1987年夏，随着势态的发展，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提出了民族主义诉求。该群体是在1944年被斯大林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上，他们曾多次发起抗议行动，力争返回故土，但均以失败告终，久而久之他们便失去了斗争的动力。直到1987年，公开化和民主化才重新给予他们新的希望，通过街头抗议，最终取得了胜利。

鞑靼人胜利的实际意义，主要是让其他民族看到，街头抗争不再受到残酷镇压，相反，还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权益。也就是说，鞑靼人的胜利，促使其他行动者重新计算成本和收益，同时也会效法他们的行动策略，因而，某一行动的胜利必然有助于后续行动的发起。

之后不久，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主义者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1987-1988年，他们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要求扩大自治权、财政独立预算等，这些运动都未受到武力镇压，甚至鲜有警察干预，这进一步鼓舞了他们的士气。1989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诉求从扩大自治权升级为民族独立，并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社会运动。由于类似的制度特征、社会结构、政治模式、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和文化相似性，波罗的海的民族运动鼓舞了格鲁吉亚、阿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乌克兰，甚至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纷纷效法，发起了本民族的独立运动。1989年夏天，民族间、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在苏联各地集中爆发。<sup>1</sup>重大的抗议运动、游行示威、罢工和族际暴力冲突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国家发生。如果说游行示威和罢工在1987年尚属罕见，那么，到了1989年和1990年，“罢工集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sup>2</sup>

1989年夏天，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让一些人意识到，苏联有可能会发生分裂。最初的传言来自戈尔巴乔夫顾问团，因为他们预测到波罗的海三国的脱离已经“不可避免”。1990年，立陶宛宣布独立，其他民族如法炮制，特别是乌克兰，直到后来的俄罗斯民族，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蓄势待发，无坚不摧。至此，局势的发展致使举国上下都认为，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的民族矛盾在高压政治下仅仅是一股地下潜流，不易被主流社会察觉，所以在1987年之前，人们以为苏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然而，到了“公开化”时期，政府从高压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施民主化，对各类思潮和运动毫无原则地放任自流，以致使民族主义思潮有机可乘，从地下跃至地上，致使分离主义病毒肆虐流播，诱发了一波波相互推动的运动浪潮，最终湮没了苏维埃联盟。贝辛格对苏联解体过程的分析主要是想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政府在民族运动发起的早期当机立断，是完全可以阻止苏联解体的，即苏联的前途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

## 五、结束语

贝辛格对苏联解体过程的分析，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动力学机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动态演化规律提供了新思维。作为中国读者，自然会把上述理论同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因为新中国和苏联都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均为政治化取向，因此两个国家具有一

<sup>1</sup> 1989年6月，剧烈的族群暴力事件爆发，包括乌兹别克人和土耳其人、哈萨克人和列兹金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暴力冲突。7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再次暴力冲突发展至更持久的武装斗争；柯尔克孜人与塔吉克人为争夺土地和水源而进行战斗；阿伯卡茨人和格鲁吉亚人在黑海海岸使用自动化武器进行战斗。1989年夏天过后，民族主义暴力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sup>2</sup> *Rabochaia tribuna*, March 10, 1990, p. 1.



定的相似性。<sup>1</sup>

根据贝克尔的研究，苏联的民族矛盾即所谓的“对民族主义有利的结构性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历史上高压政治下悬而未决的“民族矛盾”；其二，民族政策“政治化”的“社会后果”。

对比之下，第一个矛盾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民族获得解放，民族压迫从根本上被消除，为保障平等，政府为每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对少数民族实施优惠补偿政策，以实现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实现了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流动，因而，新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累积的、潜在的民族矛盾。

至于第二个矛盾，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苏联做法还是具有较大差别的，当然，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识别民族身份，建立自治地方，实施优惠补偿政策。建国六十多年来，这一“政治化”的民族政策为民族团结、政治稳定起到了莫大的维系作用，但也产生了一定的非预期后果。识别与认定民族身份，实施优惠，使个人的社会生活机会与民族身份捆绑在一起，这必然强化利益相关者的民族意识，弱化中华民族认同。

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人们的利益观念开始觉醒，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开始变得复杂、纠结，民族之间、民族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利益矛盾日益凸显。譬如，自治地方内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自治民族内部不同阶层的平等受惠机会不易保障；自治地域内非自治民族（如贫困汉族等）的反向歧视问题；人们的政治、社会和生活机会应该按照民族身份确定，还是依据个人的能力标准？选拔干部，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作、职务获得，是否应该和民族身份挂钩？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个体，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受到照顾，因为要保证民族平等，干部岗位就应按民族比例配额；但是，那些因为没有受到照顾而失去机会的人，依据现代公平理念认为“这不公平”。还有，选拔民族干部，给予各项优惠，以使民族干部进入向上流动的快车道，或许追上了汉族精英，却远远把本民族的普通群众甩在了后面，无疑，这缩小了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是，也拉大了少数民族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优惠照顾在少数民族内部就是社会经济地位分化的催化剂，如何平衡民族精英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在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和权力，升学、工作等社会生活机会的得失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议题。

2010年8月，笔者在西北一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当地政府在“扶贫工作汇报”文件中理直气壮地要求：“应该为本地某民族设置内地高中班……低保补助应覆盖本地某族全部群众……建议调研组呼吁比照‘对藏区的优惠政策’对当地某民族实施特殊照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直气壮，一名干部说：“56个民族是兄弟，就应该平等。”调研中，普通群众对“扶贫物资”、“低保名额”的分配充满愤懑和不满，认为本民族干部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往往是越有权、越有钱的人得到的越多。因此，民族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其阶层结构是分化的，利益结构也是分化的，利益关系也存有竞争和矛盾。

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或各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只是一个资源分配或占有不均的问题，关键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地位是社会地位的指示器，在一段时期内，贫困者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反而觉得无产阶级光荣，贫困甚至是一种有价的社会资本。<sup>2</sup>1978年之后，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关注的珍稀资源发生了重大变迁，以往遭到贬抑的金钱和权力资源的价值，渐渐成为社会普遍珍视的稀缺资源，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有钱”、“有权”就有身份和地位。相对贫困和弱势的人口或民族，在与其

<sup>1</sup> 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sup>2</sup>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4）。





人、他族比较时，就会感到“自卑”、“地位恐慌”和“身份焦虑”，甚至感到缺乏尊严，心理怀有相对剥夺感。

一些研究说，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民生问题。<sup>1</sup>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比民生更为重要的是民心问题。因为，时下人们不只关心“我有多少钱”，而更关心“我比别人多多少或少多少的问题”；不仅关注“我获得了多少扶贫物资”，更关注“和别人比，我得到的更多还是更少”。和别人比较的结果，决定个人的心态和自我评价，也影响他人对自我的认可和承认。所以，发展和扶贫，都要从内源发展的理念去思考，要保证利益共享，公平和正义，否则其负面效应将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迁值得关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各民族人口相对聚居、封闭，但在转型时期，汉族人口流入民族地区，民族人口也流向全国各地，不同民族人口的交往范围渐渐在扩大。交往有助于相互了解和社会融合，但也会在某些情境中容易引发冲突。因为，各族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文化上和生理上的差异，竞争就会导致偏见和歧视，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摩擦冲突或相对隔离。<sup>2</sup>

直到今天，和谐稳定依然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中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和多发时期，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官员腐败、社会失范、文化变迁，以及生态、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民族问题或矛盾，因为，“人们往往把民族分离主义视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民族主义有关‘情感’和‘利益’的议题会使其成为强大的动员力量。”<sup>3</sup>总之，我们应该正视矛盾和问题，通过实地调研，设置科学的“安全阀”化解社会戾气。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维稳工作十分重要，对各类社会思潮和集体行动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可过头，过犹不及，要有适当的安全阀，合法权益要有适当的机制加以保障；改革的力度和步伐非常关键，要稳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 【访谈录】

“‘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意思，就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sup>4</sup>

——对话著名社会学家马戎教授

郑茜、牛志勇

嘉宾：马戎，1987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马戎先生发表了《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这是一个思想者积蕴已久的爆发，显示出不可等闲以视的思想原创力。当然，学界以及社会现实，用来咀嚼和消化这个理论的时间，都不会太短暂。终于，七年之后，我们看到：民族问题“去政

<sup>1</sup> 王娟，“族群政治的制度逻辑”，《西北民族研究》2010，（4）。

<sup>2</sup> Park, Robert Ezra. 1926. “Our racial frontier on the Pacific.” In *Race and Culture*, pp. 138-151. Vol.1.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0.

<sup>3</sup>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4</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2011年09期，第4-12页。

